



～書評～

許芥焯著：

「現代中國的興起」

杜克禮 著
游麗清 譯

(一)

自從許芥焯教授的「現代中國的興起」(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於一九七〇年首次出版後，該書便一直被視為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權威之作。他網羅數百中外學者的心得，自清朝下迄中華人民共和國，編著成這部既長且值得一讀的中國史；最近該書第三版已面世，讀者如已擁有該書的舊版，亦不妨多購一本新版的，因為不僅價錢相宜，每冊售價港幣六十七元五角，而且新版中修改之處，值得讀者參考比較。

作者不僅在書末附加最新的資料，而且內文的修改也使該書更臻完美。第三版雖較第二版略短，共九三〇頁，但仍然是價廉物美，是作者去蕪存菁後濃縮而寫成的。例如

，本書的第一部份：傳統制度的沿襲——一六〇〇至一八〇〇年 (THE PERSISTENCE OF TRADITIONAL INSTITUTIONS, 1600-1800) 便刪除了大約四分之一；這當然有助於修讀中國近代史課的學生，但對於那些較重視詳細資料的學者或對歷史具有相當程度的學生，則未免有些損失。大體上，許教授只用小刀而不用斧鑿，使全部資料精華得以保留，這樣的修改，實具建設性。

每章所附的參攷書目，既長且新，單憑這些書目就值得人手一冊了，更何況它是近年中國歷史研究進一步心血結晶的明證呢！自從這部書的第二版於一九七五年問世後，很多有關的書籍亦相繼出版，有些是評論日文書籍有關近代中國史料十分貧乏，而有些



中國在四千年的歷史進程中，一如其他社會一樣，仍不斷轉變。

則指許氏往往沒有仔細考慮到他所引用的新作品的內涵及解釋。雖然如此，這畢竟是一件罕有的「研究」工作，內附有這樣豐富的參攷書目及資料，我們實該感激作者，為我們進一步的研究工作鋪了路。

(二)

該書的第一章「現代中國的思想框架」(A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MODERN CHINA)，自一九七五年以來就一直沒有修改過，當然，我們不能夠因為他不修改便批評它，事實上，從一開始，許教授便很小心構思這一章的大綱，所以他決定保留它的原貌。

這一章的內容提供給我們整部書的梗概，同時又刻劃了許氏研究的長處和弱點，實在值得我們去細心研讀。須知道，要詳細地

評論整部書的內文，並不容易，因為該書太長，若要如此評論，恐怕要另寫一本書才可。

許教授首先強調，中國在十六世紀初以前很少受到外來的影響。其後，由於與西方的接觸陸續增加，更因為到了一六四四年，滿洲入主中國，遂開始了中國歷史的新紀元。毫無疑問，這兩種外來力量是導致中國社會發生急劇變化的重要因素。(不要忘記，中國在四千年的歷史進程中，雖然轉變得很慢，但她也一如其他社會一樣，仍不斷轉變。中華文化能在多方面保持其延續性，實在令人感動。對於所謂「不變的中華」，由唐而宋，由明而清，循環交替，週而復始的這類神話，也該壽終正寢了。)

反對者所持的理由是：中國在這段時期所發生的變化，仍是源自中國本身，而不是

外來力量所引致。比如：中國自滿清入主中原，權力鞏固之後，社會安定，促進了人口的增長，這實在與西方帝國主義完全無關。而且，研究又顯示，清初的貨幣經濟、製造廠、和發展中的資本主義，也如日本的德川時代一樣，完全與任何西方衝擊無關。再者，中國在十九世紀所遭遇到最大的威脅，不是英國的槍砲，也不是俄國的軍隊，而是國內太平軍叛變所造成的緊張和動盪，儘管這種叛變受到洪秀全所信奉的非正統基督宗教若干程度的支持。

我們亦應研究一下滿洲異族的「異」究竟是怎樣的。他們雖也極力保持與漢人不同的身份，然而多數權威人士均認為他們大部份經已漢化，而且實際上，他們保留着所有明代的制度。許氏斷言：「雖有很多漢人加入清朝政府，默默地接受清朝統治，但更大多數漢人却暗地裏反對清廷。」（頁八）許氏的這種見解，實在值得疑問，因為在二十世紀前，根本就無可能去確定在中國或任何一個地方的民意。許氏也許真的誇大了十九世紀時中國人民之間的革命情緒，一如很多美國歷史學家誇張了十八世紀時美洲殖民主義者的革命情緒一樣。

許教授強調中國受到外來衝擊的影響，這種觀點與 JOHN KONG FAIRBANK 及許多中國史家抱持的觀點相同，認為中國的一連串變化都是受到西方衝擊而產生，因此，很多有關現代中國的課本或文章，都過份偏重於中國與西方的關係及外交歷史，而並未充份注意到中國國內的演進和變化，尤其是那些與外國動態或意識形態無直接關係者。儘管許氏聲稱，要「避免跌進『外來造成』的陷阱裏」，並且不要說「中國的變化只是來自對外力的反應」（頁十三）可是，

「現代中國的興起」亦不例外，有關十九世紀的部份，都集中於討論中國的對外關係和反應。

造成這種不平衡的原因是值得考慮的。對西方史學家而言，有人可能認為，他們研究中國的對外關係較之研究中國的社會和學術變遷容易得多，因為前者有英文資料供研究，而後者則要鑽研大量的中文書籍；而且，西方人亦很自然想知道西方世界對中國的影響。正因如此，西方人可能對英國士兵查理歌頓（CHARLES GORDON 別號中國人）平亂的事蹟較之中國官員左宗棠的事件知道得更多。（前者只是華而不實，而後者却是清室存亡的重要人物。）

西方學者研究中國問題時重外輕內尚可以理解，但中國史家，不論大陸的或台灣的，也是如此，就叫人有點摸不着頭腦。也許，因為他們有些在西方受教育，受到西方治中國史的方法所影響；又或者，因為中國在十九世紀中葉所遇到的西方衝擊太突然、太戲劇化、太鮮明的緣故。而中國的變化，像人口問題，在過去三百年來，都是不經不覺地逐漸增長；即使規模龐大的農民叛變，也屢見不鮮。但到了十九至二十世紀，中國面對外來的帝國主義，竟毫無招架之力，這當然使到中國的知識份子和史學家越來越感到憤恨和沮喪；他們有些更把中國的積弱歸咎於傳統制度的敗壞（如科舉制度），於是紛紛起來探求原因，結果普遍歸罪於各式各樣帝國主義的侵略。

事實上，我們可以說，西方的衝擊對中國之所以重要，只是因為中國人相信它重要并對之作出反擊的緣故。這裏我想清楚表明，我不是要原有帝國主義，也無意減輕它對於現代中國的影響，我只是想讀者明白，要

平衡地認識中國的歷史，就非要合理的關注她各方面的演進不可，絕不能單看她與帝國主義之間的關係以及所作出的反應。

中國現代史究竟始於何時呢？許教授亦拋出了這個問題。是否如毛澤東或馬克思史家所稱，它始於一八三九至一八四二年鴉片戰爭期間？抑或應該返回十六世紀明末清初西方傳教士初次接觸中國的時代？許教授明智地指出，一八三九年以後鴉片戰爭之前數年間，乃中國發生重大變革的前奏，因此，要真正了解現代中國，就不能忽略這段期間的變化。許教授並不同意現代中國乃始於一九一二年或一九四九年的說法，而很多有關當代中國的「分析」之所以這樣愚昧，實乃由於作者對二十世紀前的中國情況一竅不通。

試圖將上述兩種不同觀點調和起來，許教授是做到了。但他之將各種見解共冶一爐恐怕會引起部份讀者的反感，會認為他只是努力綜合不同的觀點和解釋，而缺乏自己的意見和立場。許氏論及傳教士、改良派、守舊派、或激進份子時，都有褒有貶。也許，自由史家（包括本文作者）有時太過喜歡運用「另一方面」、「但我們也該考慮到」、「很難下結論」等字眼，然而，就是這些彷彿「中庸」的字句往往使人迷糊，姑無論怎樣，相信大多數讀者都會為許教授不偏不倚的研究工作而鼓掌，最低限度，他比意圖說教的理論家好。

接着，許教授開始去鑑別各種「形成現代中國的因素」，但這些因素太空泛，對研究中國現代史的用處不大。首先是政府的政策與制度。他始終認為，「每一個朝代過於掛心去保存自己。」這種說法并非不正確，但很明顯，歷史上亦有少數的個人或制度故

意自取滅亡。

第二種因素是清朝期間的地下反政府勢力，包括：秘密會社和革命組織，「民族革命主義者排外的威脅」。（頁九）若以此來形容孫中山先生及其同盟會同志的革命情操，當然恰當不過，但用來形容那些在清朝之前就存在的秘密會社，就值得質詢了。事實上，它們雖是反清組織，却也從事非法活動（多屬非政治性的），亦可能反對任何政府。當然，任何政府不論在任何時代都會遭遇到反對勢力，這絕不是現代中國的特殊現象。

第三種因素是「被強迫在新的環境下求生存」。這一點也太廣泛，不僅涵蓋新時代中所有政府及思想方面的活動，亦包含了中國被迫面對新環境的困難。

此外，許教授亦提到其他的形成因素，包括：二十世紀國民黨與共產黨之爭，以及經濟和社會的轉變。許氏在建立一個中國現代史的架構方面所下的工夫，令人有點失望，這不全是許氏的錯，而是中國現代史的範圍太廣闊，而且有待完成的工作又這麼多，要確定在某些時期中所發生的事情已不容易（比如：一九一〇至一九二〇年代的軍閥時代），更何況去分析呢！許氏希望有關方面的研究能夠不斷進步，這樣才能把現代中國置於適當的歷史地位。在「現代中國的興起」一書中，許氏把所有資料集合和整理；對邁向這個目標，他已作出了不少的貢獻。

（三）

該書在序言之後，踏入正文，首先是詳細描述清廷的情況，當時的社會，以及鴉片戰爭前的對外關係。

內文有關十九世紀的情況，大多偏重於

對外關係，雖然作者並沒有忽略國內的重要發展，但我們還是寧願他能夠多點注意中國的社會、經濟、和學術的發展趨勢，而減少強調外交和政治的歷史。倘若讀者對達成不平等條約的每一個細節都極感興趣，則可以選擇與此有關的記載來讀。

該書在描述晚清的部份，非常透切準確，但在第三版中却依然有一個錯誤，就是在第三三七頁中，許氏稱中國李鴻章與日本伊藤博文就朝鮮半島而簽署的中日天津條約是於一八八四年達成，其實該條約是在一八八五年達成。

至於一九一二至一九四九年間的民國時期，該書的描叙便稍為強差人意，部份原因並不是許教授的資料有誤，而是史家對這個時期的研究比不上對晚清的深入廣闊。對這時期的爭論很多，這些爭論不但引起政府的關注，也引起了史家的興趣，而政府又經常不智地容許史家對他們手頭的文件紀錄作出獨立分析，造成一片混亂。總之，那是一個充滿混亂和分裂的時代，一切尚未確定。

對史家而言，他們對本身所經歷過的時代，很難作出平心靜氣的分析。也許正因如此，許教授在分析現代中國時，稍為偏重了國民黨和共產黨，而忽略了當時在中國的其他活躍組織。

(四)

讀者大部份都是從報章或書刊中（例如：「鼎」）去獲得中國及其歷史的資料，但對於許教授這本三度出版的著作，在名字拼音方面，他們便可能感到很不習慣，因為許教授仍沿用舊式的 WADE-GILES 拼音法。譬如：人們多看慣鄧小平的新式外文拼音為 DENG XIAOPING，但該書却譯

成 TENG HSHIAO-P'ING；雖然書末附有新舊式拼音的對照表，但要讀者經常查閱，畢竟是件麻煩的事。

很多語言學家都認為拼音方法非常優良，問題只是中文發音往往有幾個聲部，與英文發音完全不同。舉晚清幕後操縱政權達五十年之久的慈禧太后為例，若將她的名字用拼音拼出來的話，則無論是新式拼音法 C I X I，或 WADE-GILES 舊式拼音法 T Z'U-HSHI，拼出來的音和真正的中文發音仍有很大出入。因此，對那些不懂中國語音的人來說，根本就沒有任何一種羅馬拼音法，可以幫助他們把中國名稱或詞語準確地讀出來。

若把書中九百多頁內每一個中文人名及地名，都由 WADE-GILES 舊拼音改為新式拼音，將是一件很有意義的工作，這當然有賴於許教授或牛津大學出版社的努力了。新拼音法是現時甚至將來都會採用的拼音法；如果「現代中國的興起」仍沿用舊拼音法，則在這個十分重要的問題上顯得落伍了。

此外，我們希望書中能加插多些中文字，或者在每個譯音或詞語後面配上中文，又或者可以像“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一樣，把中文名詞編成附錄。這樣，對中國歷史學生、中國語文學生、以及不大認識拼音法的中國讀者來說，一定會有很大幫助。

(五)

書末的最新資料相信會是「鼎」讀者最感興趣的了。至於內文方面，描述一九七六至一九八二年間的事跡佔了一百多頁，而描述七六年以前各個時期所佔的篇幅，在比例

上就顯得很少；真不明白為何許教授要做這些看來如此費時失事的事情。許多意見在當時看來很正確和有見地，但過了若干年後，可能會變為頗愚笨和難以立足。許教授很幸運，到目前為止，他在書中講述的各種重要變革，至今仍然持續，例如：在鄧小平領導下所走的務實路綫，與美國改善關係，強調經濟發展，尋求與台灣和平統一等。然而，以此方法來編寫當代歷史，實在很難完全成功。

首先，歷史不是預言，沒有人能知道現在所發生的事情對將來會有什麼後果和歷史意義。譬如：花拉羅之獲得提名為副總統候選人，是否會對美國政壇或婦女參政帶來一些重大的影响呢？我們不知道；可能民主黨的選票會因此而下降，在十一月大選中失敗，而婦女在本世紀前將不會出任重職。現在一切都難以確定，但時間會告訴我們。

許教授似乎想盡量利用他搜羅的每點資料來幫助解決這問題，所以這部份才那麼長。「現代中國的興起」可說是極為詳盡，作者以他的「洋涇濱英語」（頁一五二）告訴了讀者一些有趣而又富資料性的細節，例如：康有為在廣州教書時常去那一間圖書館……等（頁三六三）。許氏在最後一部份更加插了不少統計數字和枝節，他告訴我們，鄧小平於一九七九年一月到訪美國首都華盛頓時，參觀了一場哈林籃球表演賽（頁八二二），而江青則在翌年出庭受審時，頭戴着一個黑色的假髮（頁八六三）。也許，籃球比賽和假髮都可能在某一天變得重要，許教授認為機不可失，不想放過吧。

最末一部份的另一點瑕疵是不夠客觀。人們都期望一個專業史家能夠客觀的去評論歷史問題。但在這部份的最開始及最後的說

話中都流露出許氏這點缺失：「一九七六年是中國悲痛的一年，大陸上每一個角落都深切哀悼三位偉大領袖的逝世。」（頁七七五）「中國人民的精英份子將有辦法使整個中國重新統一。」（頁八九九）問題不在於讀者是否同意他這種說法，而在於這些說法過於流露主觀感情，有碍客觀的治史工作。

另一個問題是，許教授有時應用一些不是很有權威性的資料來支持自己的看法。好幾次，他引用台灣「中央日報」的報導，眾所周知，該報章是國民黨的喉舌，很難視為中立的資料，但許教授却不以為然，照樣引用。他又引述米勒（ARTHUR MILLER）的說話來形容毛澤東在文革中的角色（頁七九〇）。米勒雖是一個成功的戲劇大師，畢竟，他只在中國逗留了短短數週，不能視作中國政治方面的權威。

話雖如此，我仍然覺得這部份有很多值得表揚的地方。它雖稍嫌冗長，却能夠清楚扼要地將中國最近發生的事件摘要報導。今日很多觀察家，到中國旅行數週之後，回來便大發議論，相比之下，許教授對中國的了解，就比他們深入得多了。他的見識和經驗，足以把當代中國置於她應有的歷史地位。一般而言，他算是頗為平衡的歷史家。雖然他傾向於支持中國的四化，但對於中國是否可以在二〇三〇年達到四化的目標，他亦感到懷疑。（頁八五六）。

最後，「現代中國的興起」，為那些對現代中國有濃厚興趣的人，是一本有價值的參考書。如果眼力夠，意志強，可以把全書讀完；至於那些沒有那麼多時間的讀者，也可以利用該書的詳細參攷書目去找出適合他們自己興趣的資料。